

I206.1
X718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1917—1976)

711050

第一卷



五·四：
人的文学

许志英 倪婷婷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南京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总序

本课题——中国现代文学主潮，比较确切的表述，应当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主潮或主流。究竟什么是文学思潮，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论。已有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诸如李何林著《近二十年来文艺思潮论》、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朱寨主编《当代文学思潮史》，侧重于对文学运动、思想论争、理论倡导等方面的爬梳剔括、探幽发微。这似可称作理论思潮。那么，对思潮是否还有另外的认识、理解，我们想是可能有的。至少，与理论思潮概念相对称，可以提出一个创作思潮的概念。一部文学史主要是作品的历史，而一个时代的思潮也是更生动更丰富地体现在作家的创作中。我们的这个课题正是在确认了创作思潮的概念之后，才确定下来的。本课题主要想对现代文学创作思潮的一些主要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察与研究。时间上涉及六十年，即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七六年。以六个分册系列论著组成整个课题：第一分册为《“五四”：人的文学》（1917—1927）；第二分册为《文学与革命》（1928—1937）；第三分册为《战争与文学》（1937—1949，国统区）；第四分册为《延安文学》（三十年代末至1949，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第五分册为《“十七年”文学》（1949—1966）；第六分册为《“文革”文学》（1966—1976）。这六十年，我们认为现代文学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二阶段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七六年（其理由详见第一分册附录《现代文学与文学现代化》一文）。

本课题力图显示下列特色：

一、以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一些主要方面）演进过程的宏观

把握为中心线索，将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结合起来，既大体描述出六十年间文学主潮演进的大体过程与风貌，又对其阶段性主要特征、得失影响作出较为科学的概括论述。第一阶段的创作思潮同理论思潮一样，呈现出“万花缭乱之趣”，但显而易见，“人的文学”是创作主潮。第二阶段时间跨度近五十年，如果作宏观概括，我们以为文学与政治、与生活、与群众的关系的争论、研讨及其实践，既是理论主潮，又是创作主潮。理论主潮与创作主潮尽管关系密切，但分别论述还是可行的、必要的。

二、从六十年间的大量文学创作现象入手进行综合梳理，主要就题材与主题的演进探讨文学与社会生活、政治潮流、人文环境、文学承续联系等方面的关系，并试图总结一些经验与教训，为文学的现实发展提供某些借鉴；与创作关系不大的文学论争、意识形态运动等不专门涉及。

三、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的原则，试图在对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掌握、研究中得出富有研究者个性的结论。我们预料各分册都会碰到一些老的或新的难题，在某些难题的研究上如果持之有据我们将发表一得之见。

近些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正殚精竭虑试图以文学现代化为中心内容建构一种新的价值评判系统。我们的创作思潮研究，应当是这项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寻求的是，为这项工程添砖加瓦的愉快。

本课题是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

许志英 邹恬

1991年6月

目 录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总序.....	许志英 邹恬	(1)
第一章 “五四”社会改造思潮与人的文学.....		(1)
第二章 “自我表现”		(23)
第三章 个性解放.....		(43)
第四章 人生探索.....		(62)
第五章 “非战文学”		(81)
第六章 “乡土文学”		(97)
第七章 反帝主题的初步形成.....		(117)
第八章 历史与现实之间.....		(130)
第九章 “光赤式的阱” ——革命加恋爱.....		(149)
第十章 个性解放主题的淡化.....		(165)
〔附录〕 现代文学与文学现代化.....		(184)
后记.....		(202)

第一章 “五四”社会改造思潮 与人的文学

一

如果说十九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呈现种种变革迹象，但还没有取得质变的突破，那么进入二十世纪没有多久，这种质变发生了，整个中国文化史随之跨入现代阶段。似乎谁也未曾料到，一九一五年九月，一批激进的知识者在上海出版的高张“人权”、“科学”大旗，探讨中国社会问题的文化评论杂志——《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竟激起那么热切的反响，成为两三年后中国大地汹涌澎湃的“五四”社会改造思潮的先声。由《新青年》同仁开端，中国知识者站在一个全新角度上，重新审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进而得出近于全盘否定的不无偏颇的答案。他们从探索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前途出发，逐渐清晰认识到自我价值；从对自我地位和人格权益的把握中，又增强了关注社会的热情。“五四”的思想启蒙，不仅唤醒了一部分知

识者沉睡的个性意识，也强化了他们的社会改造意识。一九一九年，标志着中国人政治上和思想上大觉醒的五四运动，使前期新文化运动向更深广的方向发展，社会改造和个性解放的呼声如同惊雷一样震撼着赤县神州。几乎所有刊物和所有文化社团都积极参加有关人生观问题以及社会改造、中国出路问题的探讨。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正显示出“五四”时代蓬勃的进取的生气。

这个特定时代的社会改造思潮和个性解放精神，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五四”青年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作为一个要求个性自由个人解放的现代个性，在封建宗法制依然处于主宰地位的社会里，不得不直接承受着沉重的历史负担。随着对现代个性意识的进一步理解，他们把视野逐渐从关心自我一己的利益，转向关心更为贫弱的普通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继而转向由自我和他人共同组成的繁杂的社会。一些最优秀的知识者首先意识到，自我个性的发展难以脱离整个社会，因而他们在唤醒自我意识的同时，也把启发民众的觉悟作为神圣的义务，他们试图通过思想文化意识的启蒙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这就使中国“五四”的个性解放思潮显示了与西方同类思潮不同的时代的民族的特色。几乎每一个“五四”个性论倡导者都是社会改造思潮的积极关注者，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个性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使“五四”社会改造思潮始终沿着争取中国人的“人的解放”的轨道前进。“五四”一代人清醒地意识到，“人的解放”的最终目标，绝不能在固有的社会制度下实现，所以他们抛弃了“五四”以前社会改良派的种种幻想，不约而同地抨击现存社会制度和传统思想意识对中国人个性的摧残，表现出彻底决裂姿态和大无畏的民主战斗精神。

与传统专制制度和思想文化彻底决裂的精神，决定了“五四”一代知识者要求的社会改造不可能是对社会的局部改造。他们亲眼目睹反动军阀官僚政府的黑暗、腐败、无能，对之痛恨到

了极点，外来的近代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已使他们对自身的价值和对社会弊端有了更为理智清醒的认识，他们跃跃欲试，希望能凭借自我的力量，从根本上改变觉醒者难以忍受的现状。一个刊物宣称：“我们与政府抵抗，不要消极的态度，要取积极的态度了”；“积极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政府不依我们时，就可以把它推倒，再建过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了。”^①这种看法在当时具有一定代表性，它对现存的军阀政府已失去信心，不抱任何企望。由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成立于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其宗旨就反映了社会改造的愿望：“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瞿秋白、郑振铎等主办的《新社会》，也以社会改造为宗旨：“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②此外的社团如周恩来、马骏等组织的觉悟社，恽代英、林育南等组织的利群书社，刊物如《新生活》、《平民教育》、《浙江新潮》、《曙光》，也都在传播新思潮的同时，研究社会改造问题。对社会改造问题的执着关注，几乎是“五四”年轻一代知识者们共同的行动，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制度的问题，也就是重造一个适应现代个性生长、发展的社会环境问题，体现出“五四”转折期一代人真正的政治觉醒和个性觉醒。

“五四”时期许多社团的政治文化主张不尽相同，甚至差异甚大，但在肯定中国社会必须进行改造上却大体一致。而在问题转到建立什么样的新社会时，人们的意见却大有歧异了。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为理性尺度，企望中国建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另外一些革命民主主义者，已经看到了以个性主义为精神支柱的资本主义

^①《“积极”和“消极”的抵抗》，《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8号。

^②《新社会发刊词》，《新社会》创刊号。

社会的种种缺陷，同时也对前期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感到失望，因而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向往也浓厚地带着“五四”时代的特点，朦胧模糊，区分不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新青年》七卷一号发表的《本志宣言》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五四”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和他们对理想社会的认识：“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辗转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当时思想界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将德谟克拉西和社会主义概念相混淆，这当然表明了那时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同时也反映了他们要求前进的倾向。关于“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想面貌，瞿秋白作过精辟的分析：

政治上：虽经过了十年前的一次革命，成立了一个括弧内的“民国”，而德谟克拉西（la d'émocratie）一个字到十年后再发现。西欧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问题，中国却还很新鲜，人人乐道，津津有味。这是一方面。别一方面呢，根据于中国历史上的无政府状态的统治之意义，与现存的非集权的暴政之反动，又激起一种思想，迎受“社会主义”的学说，其实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如托尔斯泰派之宣传等。或者更进一步，简直声言无政府主义。于是“德谟克拉西”和“社会主义”有时相攻击，有时相调和。实际上这两个字的意义，在现在中国学术界里自有他们特别的解释，并没有与现代术语——欧美思想界之所谓德谟克拉西，所谓社会主义——相同之点。由科学的术语上看来，中国社会思想虽确有进步，还没有免掉模糊影响的弊病。①

①《瞿秋白文集》第1册第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由于“五四”时期一代人接受的外来思潮的不一样，这就使他们所热衷的社会改造思潮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当《新青年》一开始把矛头对准封建伦理道德，揭露其非人道和虚伪性时，它的思想武器正是从外国资产阶级那里借取来的主张尊重人格、发展个性的个性解放的天火。此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资产阶级思潮的介绍工作日益得到加强。新文化运动初期，思想界一般还缺乏分析批判能力，分不清资产阶级思潮的积极部分和消极部分，采取了兼收并蓄甚而极端推崇的态度。因此，在贪婪地咀嚼异域的文化果实时，就不免吸进了世纪末的毒汁。然而新的毒汁仍胜于发了霉的“国粹”，崇拜新偶像仍胜于崇拜旧偶像：这是当时思想界的一个可说是共通的认识。早在十九世纪末就传入中国的进化论，这时发生更大作用。《新青年》的主将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进化论的影响。他们根据进化论的发展观点和变革观点，得出封建伦理道德不合现代生活因而必须废弃的结论；得出现实社会不合理因而必须改造的结论；得出新的必胜于旧的，将来必胜于过去的结论。同时，《新青年》有些作者在以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规律来说明社会现象时，也犯了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同样很早传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也很有影响。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都有无政府主义团体和刊物；无政府主义许多派别都被介绍进来，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为更多人所接受。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无政府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后起过不可低估的反封建作用，但当马克思主义深入传播时，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却将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这样，在许多场合，马克思主义者就毫不留情地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激烈的斗争。尼采和易卜生，也曾为许多知识分子所熟悉，他们十分推崇尼采的“重新估价一切”和易卜生的“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的名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尼采和易卜生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哲学，愈来愈成为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思想障碍。实用主义（又

称实验主义)，由于胡适积极介绍和杜威亲自来华讲解而传到中国，发生了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此外，卢梭的民约论，叔本华的自我意志说，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罗素的新实在主义等学说，也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对外来思潮取舍不一，这也就导致了人们所开的“药方”呈现出千姿百态。尽管这些“药方”大都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但它们作为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思想、传统文化的对立物出现，至少给“五四”青年一代以新的思想启迪，成为他们继续寻觅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钥匙的必然中介。

正如上述，“五四”这场社会改造的旋风本非来自古老中国本土，实际上是从欧美大陆刮来的民主科学之风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意识的一场交战。而确切地估价“五四”时期外来资产阶级思潮的意义和作用，也就是客观历史地估价“五四”这场与高张人性解放的思想启蒙相呼应的社会改造思想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侧重于介绍外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文化，原不是某些个人的行动，而是声势浩大的时代潮流，当时思想界的一些先驱者诸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都非常积极地步调一致地从事这一工作。鲁迅甚至这样说过：“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①为什么要如此“崇拜”达尔文易卜生呢？在鲁迅看来，道理很简单：“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②虽然从另一个思想层次上来说，在我国的文化传统里也不乏这种“气息”，但是应当承认，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的窒息，即使有一点所谓平等互助的内涵，也是很有限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正需要这种

^①《热风·随感录四十六》。

^②《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气息”。在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如果不是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培育了一批反封建斗士，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那么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是难以想象的。

二

“五四”新文学是“人的文学”。这是“人的发现”的时代潮流在文学上的投影。“当时的‘为人生的艺术’派和‘为艺术的艺术’派，虽然表现出来的是对立的形势，但实际上却不过是同一根源底两个方向。前者是，觉醒了的‘人’把他的眼睛投向了社会，想从现实底认识里面寻求改革底道路；后者是，觉醒了的‘人’用他的热情膨胀了自己，想从自我底扩展里面叫出改革底愿望。”^①“五四”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这种自觉是在人的自觉的影响下发生的，而人的自觉主要是个性解放意识、民族独立意识和社会改造意识的自觉，则分明体现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要求。

我们说“五四”新文学的题材与主题，同传统文学相比较，发生了巨变质变，这首先是由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革所决定的。戊戌维新以后，中经辛亥革命到“五四”期间，我国社会现代化变革的要求愈益紧迫，进程也明显加快，从走西方道路到向往俄国道路的历史抉择，从以民主与科学为内容的思想启蒙到社会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在要求文学的适应的同时，也给文学变革定下现代意识的基调。在“五四”，文学现代化至关重要的是思想意识的现代化。题材与主题，不仅仅是一个写什么样的社会人生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有一个以什么样的思想意识看取社会人生的问题。而这又不能不受到当时社会潮流、思想潮流的制约。“伟大的文学现象和重要的作家个人多半是，也许纯粹是社会大变动

^①胡风：《文学上的五四》，《胡风评论集》中册第122页。

或社会大灾难的结果。文学杰作就标志着这些变动和灾难。”^①狄德罗也曾说过，“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的时代，容易产生诗人。^②这个道理，大体可以解释“五四”新文学的题材与主题的巨变质变。“五四”时代正是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大灾难和大忧患”接踵而至，开放与封闭、光明与黑暗、革新与守旧，空前激烈地拼搏着撕裂着。对于社会潮流、社会问题的关注，成为极其自然的时代风尚。这也转移了“五四”初期一部分过于拘泥于个人天地只为自身婚恋等问题所烦恼的年青人的视野，使他们看到自我创伤之外的更为怵目惊心的种种社会弊端以及普通劳动者的惨不忍睹的物质、精神的悲剧，进而更客观更科学地认识自我的地位和价值，认识自我生长的条件和环境，理解自我与社会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观念鲜明地昭现了“五四”一代人觉醒了的现代个性意识的不断发展——与民族独立意识、社会改造意识日益紧密地结合，从而对“五四”新文学的题材与主题产生决定性影响。

题材与主题的巨变质变，是由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来实现的。作家的政治意识、思想风貌、生活积累、审美取向诸种因素制约着文学题材与主题的演变方向及幅度。“五四”新文学作家，举凡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胡适、冰心、郭沫若、郁达夫，尽管在上述诸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就主导倾向而言，他们都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初一代现代型知识分子。他们通古今之变，学贯中西，深知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近代的差距，于是在广泛的思想营养的汲取中，民主主义的现代意识和社会主义的现代意识成为他们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核心。正因为有了新的思想装束，他们反思我国传统文学，才发现“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

^①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第3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②《论戏剧艺术》，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册第371页。

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而“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①因此在社会改造、思想革命的强劲的时代潮流感召下，文学的题材与主题的现代化变革势在必行。在强调广泛表现社会的同时，张扬人性、个性的旗帜，是“五四”新文学的题材与主题的革新的总趋势。这一点直到今天都是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文学观念的更新，也对题材与主题的演变起着催化作用。旧文学之所以旧，首先旧在观念上。在“五四”前夕，主要有两种封建主义文学观有很大影响，一是“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文学观，一是把文学当作游戏消遣的工具的文学观。“五四”文学革命中，先驱者对封建主义文学观进行了声势浩荡的批判，这时以现代意识为思想基石的新文学观的地位才得以确立，并产生广泛社会性的影响。由于价值取向的不一样，“五四”新文学观纷然杂陈，不同的社团、流派往往有自己不同的文学观，甚至在同一个社团、流派中，文学观也大相径庭。总的状况也许是这样，一部分人倾向客观再现，文学“为人生”和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成为他们的基本信条，并主张文学应当发挥其作为“改革社会的器械”的作用；一部分人则偏重主观表现，他们强调文学应当展示人的悲欢离合以及其它“内心的要求”，甚至于主张文学是作家的“自我表现”、“自叙传”。在“五四”，这两种倾向有对峙，也有渗透，有诘难，也有协调，共同构成了多元繁复的奇观。而从总的情况看来，“五四”新文学观不仅正确处理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而且突出了人作为创作主体、表现主体的地位，文学的独立品格、创新意识也相应地得到了确认。这对“五四”新文学的题材领域从“苍蝇之微”到“宇宙之大”的拓展，对社会改造和“人的解放”的主题的确立，自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①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作家思想和文学观念的现代化，决定了“五四”新文学的题材与主题的演变。在中国文学史上，题材与主题的递嬗虽不断发生，但就广泛性与深刻性而言，由于“五四”是在整体上以现代意识取代了封建意识，使文学的思想素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而这是典型的划时代的革命。这种革命的总体特征，如果寻求最简单而涵盖面又最大的概括，可以说一是“新”，一是“多”。新的思想意识，新的题材选择和新的主题开拓，构成了“新”的内容质地。与“新”俱来的是“多”，亦即多元化。而在表面多元无序的状态之中，又有两个有序系列可寻，一是人性系列，一是社会性系列。本书所列十章内容，第二、三、四、八、十章大体属于人性系列，从不同侧面呼唤“人的解放”；第五、六、七章大体属于社会性系列，从不同角度张扬社会改造；而第一、九章则是将两者集于一体。这十章内容，只能说是“五四”新文学的题材与主题的一些重要方面。此外，如广泛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中国留学生的异域生活和外国人的生活（在外国与中国）的展现、除爱情之外的“家庭的故事”的描写等等，在构成“五四”新文学的题材与主题多元特征时，都有各自的地位和意义。大凡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由于王纲解纽、思想“禁区”被突破、价值观念更新、思维空间拓展等原因，文学的题材与主题总是呈现出“新”与“多”的总体特征。仅就“五四”时期三、四年情况来看，这个特征就已很明显。

作为思想启蒙家的鲁迅，始终致力于社会根本问题的探讨和国民现实状况的剖析。在《新青年》上，他写了众多短小犀利的《随感录》，一针见血地揭露中国社会的弊病所在，揭露几千年封建专制和封建文化意识对中国人的残酷的奴役。一九一八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现代小说《狂人日记》，引起广泛的社会震动，除了因为小说全新的格式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小说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个古老国家漫长的“吃人”历史，发出

了动人心魄的“救救孩子”的呐喊。从一开始，鲁迅在探索这个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时，就显示出比他同时代作家更广阔深邃的思想洞察力。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不少小说佳作。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思考从不停留在无关紧要的枝节上。如果说在《狂人日记》中对中国家族制度问题的揭示还略显空洞的话，那么在《孔乙己》中通过孔乙己迂腐、麻木的悲剧形象，对中国封建科举文化的批判；在《药》中通过华小栓吞下沾满先烈鲜血的馒头却无可挽回地死去的事实，对中国民众不觉悟的揭示；在《风波》里通过七斤夫妇以及众多村民对张勋复辟的反应，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必然性的揭露；这一切都显示了鲁迅无可辩驳的敏锐和深刻。虽然鲁迅没有象其他同时代作家那样，或者把笔触集中伸向青年读者最敏感的婚恋领域；或者大篇幅描绘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生活难以为继的图画；或者揭露各派军阀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丑行，然而他选择的表现角度，却显示了更为独特的思想深度和艺术视野。鲁迅比任何作家都更鲜明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事实，就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所形成的民众本身的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无论是对他们自身的命运还是对中国社会的前景，都是最严重的危机。所以他在《故乡》中，不仅注重反映闰土因为“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交相煎迫而造成的物质贫困景况，而且更多地把注意力运用于刻画这位童年朋友对一切淡泊漠然，唯独对敬神拜佛的烛台表现出兴趣的可悲的灵魂。鲁迅对社会黑暗、人民不觉醒状况的揭示，尤其是对其内在原因的考察，是当时以及以后大多作家所难以企及的。在短短的二、三年时间里，鲁迅塑造的一系列生动鲜明的国民形象，都不约而同地给人一种沉重感和压抑感。他并不简单地为人物命运的不幸而深表怜悯和同情，他对吃人旧制度的激愤，对民众愚昧麻木的痛心，对中国前途的焦虑，统统汇集于笔下，使他无论对孔乙己，还是对华老栓，都抱着一种极其复杂的感情。这正是鲁迅自认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随着一颗文坛巨星的升起，“五四”创作界也逐渐活跃起来，众多的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大小不一的文学社团也相继宣告成立。年轻的一代作家用笔尽情倾诉着个人悲欢，同时也自觉地关注着社会。虽然都置身于“五四”“人的解放”的时代潮流中，但这批比鲁迅年轻的作家却显示了各自不同的特色。在繁杂的各种为青年人所崇奉的文学名目中，“问题文学”可说是“五四”前后社会改造思潮中最早的创作果实。不同的刊物、不同的社团的作者几乎都在一定程度上涉足于此。

“问题文学”一般说来是指“问题小说”，最先提出“问题小说”概念并对此作出解释的是周作人：“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这种著作，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所以形式内容上，必须具备两种条件，才可担当这个名称。一、必具小说体裁。二、必涉及或一问题。中国从来对于人生问题，不大关心，又素以小说为闲书，这种小说，自然难以发生。”^①除“问题小说”外，当时还有《终身大事》（胡适）、《泼妇》（欧阳予倩）等所谓“问题剧”的出现。至于诗歌，当时虽没有“问题诗”的称谓，但提出并探索社会人生问题的诗为数也不少。“问题文学”不管是小说，还是戏剧、诗歌，在思想内容上有着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从现实人生出发，提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揭示形形色色的社会弊端，试图引起人们的注意。从当时众多的“问题文学”创作中，我们看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种种黑暗、丑恶的社会现象，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奋斗与挣扎，看到了“五四”一代人对自我发展道路、社会前途、国家命运的探索、追求，看到了中国人现代个性觉醒的闪光。“问题文学”尽管只是提出些问题，而未能解决问题（事实上，文学中提出的社会问题也根本不可能通过文学的途径得到解决），但它洞察现实社会的千疮百孔，揭示出社会病苦的严重程度，这本身正

^①仲密：《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每周评论》第7号，1919年2月2日。

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鲁迅的所谓“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恰好道出了“问题文学”的意义。我们认为五四运动是我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如果从题材内容方面来说，“问题文学”以其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考，对祖国未来的关切，以及所体现的民主主义精神，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问题文学”和鲁迅的创作一样，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烈的社会意义。鲁迅曾对《新潮》上发表的揭示社会诸问题的小说谈过自己的印象：它们“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说家（指旧派小说家——笔者）梦里也没有想到过。这样下去，创作很有点希望”^②。

暴露封建主义的宗法制度、道德精神、礼教传统的弊害，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也是“问题文学”的重要内容。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提出来，几乎是“五四”前后激进知识者的共同行动。从一九一七年《新青年》二卷六号辟“女子问题”专栏开始，对妇女职业问题、教育问题、法律上的权利问题、社交问题、婚姻问题、经济独立问题等等，展开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超出了妇女问题本身的范围，而成为总的反封建伦理道德斗争的重要一翼。一九一八年开始，贞操、节烈问题更为思想界所重视，继而引起文学界的关切。夬庵笔下的那个“贞烈的孩子”——十四岁的阿毛——被父亲王举人用最残酷的手段活活饿死，去换一块“贞烈可风”的匾额（《一个贞烈的女孩子》）；杨振声笔下另一位“贞女”，因为未婚夫亡故，只能与一块木牌神主结婚，整天“对着那座神主呆呆的看”，终于吊死了（《贞女》）。这一幕幕血淋淋的惨剧，无不暴露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叶圣陶的《一生》和周志伊的《风雨之下》，则从另一角度提出妇女问题。这些小说把妇

①《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②《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鲁迅书信集》（上）。